

# 遇見黃東

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

程美寶 著



一名中國男子的肖像，據說是黃亞東；喬治·丹斯（1741—1825）繪，大英博物館藏

Portrait of a Chinese man, said to be Huang Ya Dong; Drawn by George Dance (1741—1825), Museum number: 1967, 1014. 67, British Museum Collection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 目 錄

弁言：在大英圖書館邂逅黃東 ..... ▶ 1

「東方之黃色」 ..... ▶ 15

一、公司大班布萊克 / 16

二、廣州事仔黃遠東 / 24

三、中國僮僕「Wanoton」 / 53

四、久居英倫「中國通」 / 63

五、回到省城的 Whang Tong 先生 / 88

「沙文」與「做廚」 ..... ▶ 117

一、「沙文」名目，永遠禁止？ / 120

二、主人的口味，廚子的技藝 / 136

三、事仔的尊嚴，事頭的感情 / 149

四、最卑微卻最前沿 / 158

遇見黃東 ▶ vi

水上人引水 ..... ▶ 167

一、上船引入，星馳稟報 / 169

二、引水章程，中英並茂 / 175

三、番鬼銀元，真偽莫辨 / 180

四、蹩腳外語，鹹水情歌 / 190

五、容閱的語文老師 / 198

代代相傳的英語課 ..... ▶ 209

一、沒有英語的英語課本 / 211

二、有英語的英語教材 / 223

三、潘啟官的英語 / 229

四、說得了，聽得差，看不懂，但能教 / 244

五、20世紀末的遺存 / 254

序曲：說好的「大世界」呢？ ..... ▶ 263

致 謝 ..... ▶ 283

繁體版後記 ..... ▶ 285



# 弁言： 在大英圖書館邂逅黃東



不經意間談到 1999 年，到 20 世紀末了，小人物算是閃亮登場了，說好的大世界呢？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黃東所在的「界」——空間——亦有亦無。在省城西關的商館區打滾過一陣後，他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員登上洋船，從珠江口出發，遍歷許多暗礁，進入廣袤的洋面。這片洋面連着一個又一個港口，讓黃東和許多跟他情況相若的小人物，在許多東西方的大人物未敢逾越東西時，下南洋，出西洋，到 19 世紀更橫跨太平洋，落腳美利堅。在 18 世紀，對清廷來說，黃東「離境」，屬被「夷人夾帶」或「偷載出洋」，地方官是要照諱盜例革職的。<sup>1</sup>但對外國而言，黃東「入境」，似乎不需要什麼簽證或居留證，儘管這不等於說他會得到「平等對待」，畢竟他是一個「外人」(strangers)。

更值得討論的是，黃東身處的「世」——時間——

是長是短不好說。用中國紀年來說，是乾隆中後期到嘉慶初年，有人說這段時期標誌着中國「由盛轉衰」；用西方紀年來說，好像不過就是一個數字——18 世紀。然而，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曾流行過一個名為「漫長的 18 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 的說法，也許有助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時代。簡單來說，這個說法的意思就是，18 世紀在許多方面俱承前啟後，好些貌似停滯的現象是 17 世紀甚至更早的傳統的延續，好些細微的變異則為 19 世紀出現的大變局的鋪墊。世紀不過是人為的數字，所謂「承前啟後」似乎是必然的，「漫長的 18 世紀」的意義在於回應中外歷史皆有的「傳統—現代」敘事方式。例如，有些英國歷史學家以 1688—1832 年作為「漫長的 18 世紀」的起訖點，目的不在於強調 1688—1689 年光榮革命的影響，而在於點出 18 世紀許多方面的發展，尤其是政治和宗教等範疇，皆屬 17 世紀末的延續；而 19 世紀發生的許多急速變化——人口激增，工商繁榮，交通發達——在 18 世紀下半葉已見端倪。<sup>2</sup>英語世界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也有類似的見解，韓書瑞 (Susan Naquin) 和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在 1987 年編撰出版《十八世紀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書時，便開宗明義地說該書所論述的 18 世紀，係指 1680—1820 年亦即清初至清中葉期間。她們認為，此段時期發生的社會變遷至為關鍵，因此也是最自然不過的分析時段 (the most natural period for analysis)。借用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長時段」(longue durée) 的概念，探討此段時期逐步出現的各種變化，尤其是經濟的發展與多元化及其帶動的人口增長和社會流動，對理解許多中期現象和短期事件不無裨益。<sup>3</sup>

我們不妨把「漫長的 18 世紀」看成一個比喻，這段時期，在我們備受 19 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影響的 20 世紀人類看來，很朦朧，很緩慢。的確，黃東在英國時，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 年乘馬車從倫敦去牛津要花上兩天，1828 年則是六小時——我們可以想像，黃東 1775 年從倫敦去一趟牛津至少也得要一至兩天吧。黃東跟老布萊克住在倫敦，也許頗能感受一些城市氣象，但當時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住在居民少於一千的鄉村或小市鎮裏，鄉郊大部分的土地則掌握在少數的貴族和紳士家庭手中。<sup>4</sup> 那時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平民」的等級 (hierarchical)

社會，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 (class) 社會。黃東生活在老布萊克先生、班克斯爵士、多塞特郡公爵等重重蔭庇 (patronage) 的圈子裏，屬於現在所說的「慢活」，相信感覺頗悠遊，但不一定很自在。

黃東當然不會想像得到，這個顯得有點「慢」的洋人社會，正是逐步以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全球擴張的大英帝國。那時候的英國政府，不一定有一張很清晰的帝國擴張藍圖，但國家對資源的索求，商人對利潤的追逐，紳士或准紳士們對博物和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三者的結合，成就了英國 19 世紀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黃東也許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布萊克父子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去蒐集各種植物資料，小心翼翼地把種子寄回英國，要他解釋這解釋那；為什麼班克斯對中國的萬事萬物都那麼感興趣，老是向他問東問西；為什麼那位波特蘭公爵夫人，不過一介女流，卻要他辨識中國皇帝的年號，換算中西紀年；為什麼東方學家瓊斯唸唸叨叨，老是要他幫忙翻譯《詩經》。黃東對各人的問題有問必答，盡量滿足各方的需求，甚至回到廣州，也不忘向他的英國朋友寄書籍和手信。黃東看來是個盡職的

「事仔」，可靠的朋友。當然，他回國後以外貿為生，我們也可說他懂得禮尚往來的營商之道。

循着這個引喻，19世紀就顯得很急速了。我們不知道黃東何時去世，假定如上文所說，1775年他年約20，鴉片戰爭前夕他已經80多歲了，以當時的人均壽命算，諒必不在人世——順便一提，班克斯和潘有度這兩位通過書信神交的朋友，不約而同在1820年去世，前者享壽77，後者65，都沒有親睹中英戰爭的一幕——無論如何，黃東很難想到，他住過六七年、結交了許多朋友的那個國家，後來會派軍艦遠征，封鎖廣州、廈門，長驅直上，攻佔定海，直抵津門。繼而又從虎門入黃埔，兵臨省城，闖入三元里，登上鎮海樓。不要說乾隆時人黃東難以想像道光年間的事，那位在19世紀初多次去廣州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布萊恩特·蒂爾登，便曾在他的私人日誌裏感歎說，他在廣州的頭幾年（1815—1819），經常到行商的別墅和花園共進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過得愜意非常，但時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復返。<sup>5</sup> 不足廿年，便時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們無意用歷史目的論來倒敘黃東的故事，我們

是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發生的許多變化，是否如大家已經熟知的近代史論述所說，是由鴉片戰爭的炮火引爆的。我們有沒有想過，五口通商、洋務運動、華工出洋、幼童留美，誰是真正的推動者？如果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都是「封閉」和「停滯」的，哪裏能突然冒出一羣樂意冒險或可以勝任的小人物，在新時代扮演各種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經商、後來被清廷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的胡璇澤（Hoo Ah Kay Whampoa, 1816—1880），在馬六甲受洗、後來在廣州刊行《勸世良言》的梁發（1789—1855），在廣州跟隨伯駕學西醫的關韜（Kwan Ato, 1818—1874），等等，都是後來載入19世紀的史冊的人物，但他們的背景，可能跟黃東和前面述及的僕人、引水人差不多。人稱「黃埔先生」的胡璇澤，更是出身於洋船停泊錨地所在的黃埔村。其實，不論中外歷史，套用「漫長的18世紀」這個說法所共同針對的，都是來勢洶洶的、披上「現代」這件外衣的19世紀。以中國歷史的論述而言，說18世紀「漫長」，是因為它不像19世紀那麼急速地「被列強用炮火打開大門」，再來「自強」「中興」，然後「變政」「革命」，最終走向新世紀。不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其他各國而言，

19 世紀都像一隊勇往直前的大軍，彷彿有意識地推動着歷史的步伐前進；18 世紀則像個慢條斯理的老太太，用她一套粗糙笨拙的方法，不聲不響地為下一世代鋪路，而且無聲無息地殘存了好一段時間，例如，本書第四章所說的「代代相傳的英語課」，就屬於這種「粗糙笨拙的方法」，但它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我們都知道，時間的快慢長短不過是感覺，18、19 世紀誰快誰慢，誰傳統誰現代，在於歷史如何書寫。因此我們說，所謂「漫長的 18 世紀」，不過是一種理解歷史的引喻。其實，許多歷史的寫法，難道不是更像夾雜事實與神話的修辭 (rhetoric) ？

細心的讀者應該已注意到本書第三、第四章所用的文獻，不少是 19 世紀甚至有少部分是 20 世紀的，與第一章跟黃東直接相關的 18 世紀的文獻及其所呈現的事實，頗有一些距離。其實，文獻的「缺失」，何嘗不是在說明一個史學和史料的問題？首先，為什麼有些史料「不存在」？說不定是歷史的主人翁跟後世的治史者開的玩笑。我們不要忘記，黃東「離境」是違法的，他與洋人關係如此密切，即便不被說成是「漢奸」，也會被認為是「貪其貨財」的「無賴民人」。他回到廣州之後，

何必將他在英國的所見所聞書寫下來，留之於世？也許他寫過，但到底沒有付梓，也就沒有留下來。其次，正如本書所言，過去大部分的老百姓識字不多，是用口傳心授的方式傳遞知識和信息的，自然也就沒有留下許多痕跡。最後，我們還需注意有一個「手稿」的階段或狀態，第四章論述代代相傳的英語教材便舉出好些例子了，有些手稿後來成為粗拙的木刻小書，在當時或許大量印製，但這類書籍在中國社會長年被不屑一顧，罕有保留下來，這也是為什麼大量這類史料都藏在海外。18 世紀與 19 世紀之間的「缺口」，從史料的角度看，經歷的就是上述各種情況。因此，本書所用的都是一些「操作性」的史料，也就是說，黃東無意流芳，也不自視為文人，沒有出版什麼遊記或自傳，關於他的材料都是他為布萊克父子打工時的筆記或外國人的敘述，我們聽不到一個黃東自述的故事，而只能從這些筆記中推敲他為何這樣或那樣「留痕」。第三、第四章的資料，像外國人學中文和中國人學英語的小書、中國人用以辨識銀元的手冊，都屬於時人的實用出版物，我們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去理解這些書籍為何這樣或那樣編纂，從中可以提取什麼，來折射許多可能的情景。借用人類學家和

其他研究者收集得來的當代人的歌聲，也是為了提醒自己，歷史上大量的「史料」，是以口述的方式存在過的，但大多已隨風而逝，而以文字方式存在的史料，只是極少的部分。

18世紀甚至更早造訪歐洲的中國人，當然不止黃東一人。早在17世紀末，南京人 Mikelh Xin（又作 Michael Shen，一般音譯為沈福宗或沈復聰）便被耶穌會傳教士帶到歐洲，並在牛津大學協助整理中文圖書。<sup>6</sup>1702年，福建人黃日昇（過去按其西方教名「Arcadio」譯作黃嘉略或黃加略）到達羅馬和巴黎，協助編纂漢法字典。<sup>7</sup>據陳國棟研究，清初去過歐洲的人至少還有山西人樊守義（教名 Louis），以及來自爪哇的華人「祖國的威廉」和周美爹；至乾隆年間（1736—1795），除了黃東和陳佶官（音譯，Tan Chitqua）外，還有林利官（Loum Riqua）、丹亞彩（Tan Assoy）、蔡阿福（Choi-A-fuk）、謝清高、「香山林亞九（Lum Akao）」等。其中，丹亞彩和「香山林亞九」分別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法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的僕人，丹亞彩更被借與海牙一名律師，為他的中國文物藏品書寫品名標籤，加以拼音和翻譯，所做之事與黃東頗為類似。<sup>8</sup>就在黃東和陳佶官身處英國的當兒，另一

個身處歐洲的人是 John Hu（一般譯為胡若望），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著《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說他在1772年被一個耶穌會神父從廣州帶到巴黎，原來答應為該神父整理中國圖書，後來因為行為舉止讓當地人難以理解，被認為發了瘋而遭監禁在瘋人院裏達兩年半之久。<sup>9</sup>史景遷還提到其他幾個跟隨天主教士到過歐洲的人。<sup>10</sup>近年，王宏志和沈艾娣致力於研究曾在1773年去歐洲學習後任馬戛爾尼使團翻譯的李自標的經歷。<sup>11</sup>上述好幾個人物都與教會有關，事跡因而在相關檔案有所披露。陳佶官的故事，由於與藝術有關，得到藝術史家（如祈大衛）的細心考證而發揚光大。祈大衛親自審視了一件又一件由陳佶官手製的現存於世界各國不同的博物館的陶像，寫就了一篇鴻文。<sup>12</sup>陳佶官加上其他幾位在18—19世紀初去過歐洲的中國人，包括林利官和容三德（Yong Sam Tak）等，近年也成為歐洲史的研究對象。<sup>13</sup>

近年來，我跟沈艾娣就「小人物」這個課題有較多討論，她在披覽歐洲史料時，每碰到這類來自中國尤其是廣州的「小人物」的故事，便會慷慨與我分享。就在此書完成之際，她又介紹我看一本書，書中述及一個跟



黃東差不多時候即 18 世紀後期到達英國，名叫「澳門的威廉」（“William Macao”）的中國人的故事。「Macao」當然不是他的本姓，只表示他來自澳門，此人雖然也是從僕人做起，但後來的經歷與黃東大不相同，在此值得多添幾筆。至遲在 1775 年，20 歲上下的「澳門的威廉」坐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到達英國，在蘇格蘭北部某家庭當僕人，其後在僱主推薦下，在貨品稅務機關（Board of Excise）工作，1781 年在該機關任職男僕助理（Assistant for Male Servants），屢獲升遷，1790 年更升任總會計師，可見他已具備相當優秀的英語能力和專業知識。隨後他受洗入教，成為教堂長老（church elder），40 歲時與當地人結婚，育有二女一子。到了 1818 年，他和一些在英的「外國人」希望根據 17 世紀的法案，通過購買價值 1000 蘇格蘭鎊的蘇格蘭銀行股票以取得英國公民身份，政府認為此屬法律漏洞，欲加以堵塞，他代表有關的股票持有人與政府對簿公堂，曾一度勝訴並取得蘇格蘭公民（Scottish citizenship）身份，但雙方一再上訴，20 個月後這個公民資格便被更上一級的法庭駁回取消。「澳門的威廉」雖然「國籍」有虧，但還算熬出頭來。他當僕人出身，在外國社會躍升成另一種僕人——

公僕（civil servant）——在貨品稅務機關工作了 45 年，1826 年退休時取得相當於一年薪水（327 英鎊）的一次性長期服務金。最後在 1831 年魂歸蘇格蘭，與 1802 年便離世的妻子同葬於愛丁堡一個教堂的墳場。<sup>14</sup>

黃東、「澳門的威廉」和類似的人物對歷史學徒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史家都提倡要由下而上研究歷史。黃東的這個「事仔」身份，也夠「下」的了，讓我們可以「上下而求索」。韓書瑞、羅友枝在《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裏，也特闢幾段提到僕人在中國社會的角色不應被史家忽略。她們說：「在精英人家裏家傭的角色少有被中國社會史家分析。僕人為其主子擔負各種關係密切的職能（服侍、洗澡、餵食、更衣、購備物資，等等）。此外，僕人與家庭成員的界線——正如『家人』這個詞所表達的——有時也模糊不清。」又說：「由於僕人最好從較遠處聘來，又通常來自較貧困的家庭和（甚至非漢人）區域，家庭裏〔主子〕與僕人的人際互動經常有助促進不同區域與階級的文化和傳統的融合——飲食、語言、習俗等方面。」<sup>15</sup> 本書從黃東的故事出發，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討論僕人、廚子和引水人，為的是一直向「下」

追尋，從有名到無名，從個人到羣體，將黃東這個看來「特殊」的故事，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脈絡中去理解，變相回應所謂「特殊性」和「普遍性」或「是否有代表性」的問題——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隨着資料的發現和公開，網絡空間可資史家利用的數據越來越多，這類「小人物」的歷史，相信也一定會越來越精彩。我在2003年寫下《「Whang Tong」的故事》一文，副標題是「在域外撿拾普通人的歷史」，如今，我們「撿拾」碎片的方式，有部分可以是通過「檢索」數據庫得來的了。

黃東有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嗎？有，我們現在可以檢索到，前提是要知道用什麼關鍵詞。近年我知道他名叫「黃暹東」，又稱「黃亞東」和「黃東」，那就好辦了。借助基本古籍檢索，我找到了一條——出自張蔭桓的《三洲日記》。張蔭桓在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祕魯三地，歸國前在英國逗留兩周。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他隨「英使新襲伯爵」參觀當年已局部開放的諾爾宮室。對此似乎印象十分深刻，晚上回到住處即細心記下這次經歷。他說：「英使新襲伯爵，係母氏所遺，

園地廣五千畝，石屋廣二十畝，自建造至今六百六十九年……窮半日之力不能遍覽……返寓約記，其居石院八、樓屋一百五十、樓窗三百六十六、樓梯七十五，英都極古極闊之居，每禮拜五日准遊人往觀，如博物院之例。」談到宮室內外的細節，他的記錄是：

[九月] 二十日，癸亥，晴。早飯後，一點鐘四十分，乘火車訪英使鄉居，譯言「七椽樹」。英使備車來迓，從園道繞至石室，周遭約十里，園中麋鹿八百頭，山雞、孔雀之屬，遊行自在，極苑囿之大觀。石屋外式如炮壘，中為重門，頭門立銅石諸像，二門則其住宅，門洞內有石院子，略如日國王宮之式，樓上四圍可通，滿壁油畫及極古几榻，有英君主臨倖之室，陳設皆銀器，桌亦雕銀為之，臥榻帳幔，刻金線織成，費英金二千磅。有雕鏤木櫥一架，珊瑚作柱，可云奢矣。樓上最古之物，則未製鐘錶以前測日之器，又吾華五彩磁餅一，口徑五尺，亦非近代物也。其他磁器多可觀。

看完莊園、銀器、家具和中國瓷器後，張蔭桓把目

光轉移到油畫。他說：

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sup>16</sup>

不知張蔭桓有沒有追問下去，即使有，接待他的那位生於 19 世紀的「英使新襲伯爵」也不一定知道外公當年的逸事。翌日，張蔭桓往訪「蠟偶院」，注意到「伍怡和蠟像猶存」，還特意指給同行者一看。<sup>17</sup> 他當然知道「伍怡和」就是行商浩官伍秉鑾，但恐怕沒想過伍秉鑾（1769—1843）和黃東在時間上有交集，極有可能彼此相識吧。

張蔭桓「不知何許人」這句話，正是「黃東」這個名字在過去中國近代史書寫中最有可能出現的註解。黃東的故事，儘管很可能曾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的廣州、澳門一帶口耳相傳過，豐富了許多本地少年人對遠邦異域和自身前途的想像；他和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用自己的方法締造世界，但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卻沒留下多少痕跡。就好像今天諾爾莊園的

鹿一樣，所剩無幾，即便偶然閃身，也不過是「不知何許人」（nobody）而已。（圖 28）張蔭桓有沒有想過，他 19 世紀末之所以會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為在前頭的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不知何許人」，為他搭橋鋪路呢？



▲ 圖 28 諾爾宮室，位於英國肯特郡，張蔭桓在這裏遇見黃東的畫像。照片攝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當日我趕上最後一節展覽時間，匆匆走進宮室，一睹黃東畫像，黃昏離開時，穿過偌大的莊園走回城裏，在園中斜徑遇到一位老人家（並非圖中這位），他熱切地指着不遠處告訴我有鹿，我凝視良久，果然看見一隻。